第五辑·序

人是从“略识之无”开始学习“阅读”的，但很可能十几年、几十年下来，还未必能真正“阅读”。有时虽然读得欢畅，自己以为“阅读”已经上路，可是同有些内行大家一比，却还矮了一截。此研究“阅读”的必要性之所在。至于西方现代理论家之看重“阅读”，认为它可以表呈潜意识，可以重估思想史，可借以理解人类主体的表意过程等等，自然立意更加高明，只是为文深奥费解，“阅读”此类理论已为我辈所不能，何况用这理论来指导“阅读”，只能表过不提。

看起来，中国的读书界对“阅读”问题的探讨兴趣逐步抬头，这可能是读书札记、学术小品之类畅销的一个原因。若然，真是中国出版界的一大幸事。因为，要让正儿八经的出版业真正繁荣，除了管理层面的适当“松绑”，让出版者和读者有较多选择权，更重要的，是仰仗读者们“阅读”能力的提高，学会使用“选择权”。前面一个问题，已经嚷嚷多年，什么“读书无禁区”，什么“图必须四门大开”等等，在前贤先人、高明主管的努力下，可谓已经大著成效。一年出书十来万种，尽管其中还是问题重重，但毕竟琳琅满目，一走进书店，同过去满壁凄凉不可相比。可是后一问题，似乎还得努力。如果书店的多数主顾们不容易被诓骗，大多读书的人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则何愁优良读物没人赏识，也不必担心低劣读物会占领市场了！

一念及此，又激起我们再编几册《书趣文丛》的勇气。因为环顾书市，虽然同类出版物不少，仍然有不少“阅读”大家“漏网”。而就中国近代“阅读”史来看，这些位大家是不能不令人注意的。从大家名作中学习“阅读”，可能比研讨符号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解构学之类阅读理论更容易措手，更易为人接受。时下同类的丛书已有十多种，有些更以“一网打尽”为职志。无论就事业就商业言，我辈大可就此退隐，另觅谋生或不谋生之途。但从补苴的角度说，似乎还有可为。因为凡事如欲“一网打尽”，必然有所子遗，从而可以让一些小编辑来作补苴罅漏的营生，各尽其能，却也相得。何况从这里所选十位大家的名作可以看出，以中国之大，“一网打尽”委实不易。

讲到这里，似乎还可交待一句：《书趣文丛》产生的原委之一，其实就在补苴罅漏。人们误传它是同类丛书的始作俑者。大误。在它之前，已有有关的著名丛书。只是一时之间，有关的丛书容纳不了如许选题，不能不压缩范围。一时斫下十来个题目，而编辑手边已经有稿，又正好在有的刊物中出现了读书有趣或无趣的讨论，于是只能“分流”。“分流”也者，其实也可叫“嫁祸”，因为所以斫下选题，只是为了害怕亏本（当时也确实亏不起）。将不肖的“赔钱货”远嫁关外，配流他乡，隔不多时，流外之物居然成材，而且蒙名流大家赏识，得以持续出版至第五辑，实为始料未及。然而归根结柢，还得感念关内关外的诸多公婆，耐心帮助抚育。编撰中国出版史的衮衮诸公，大可以此事为中国出版“全国一盘棋”以至兴旺发达的一个注脚。一笑！

脉望

1997 年 10 月

目录

一封未拆的信/5
忆《少年》祝商务寿/10
忆小学乡土教育/12
一代良师/16
做人要做这样的人/19
在人生的天平上/24
清华人的一代风骚/30
顾颉刚先生百年祭/43
人不知而不愠/50
《江村经济》前言/67
潘、胡译《人类的由来》书后/71
《美国与美国人》旧著重刊前言/79
旧话相应/83
日译《生育制度》序/90
《费孝通社会学文集》自记/98
重刊潘译注《性心理学》书后/101
《社会学文选》自序/110
《山水、人物》自序/116
《云南三村》序/120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名家自选学术精华丛书》自序/128
《人文类型》译者的话/132
《外访杂写》前言/137
《行行重行行》前言/142
《城乡协调发展研究》后记/145

《逝者如斯》后记/163
《走出江村》序/165

我看人看我/168
应该说是有点缘分/174
孔林片思/177
猴年辞岁/183
寻根絮语/186
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196
讲课插话/202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211
青春作伴好还乡/227
附录：一九五七年的两篇老文章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243
“早春”前后/254

一封未拆的信

——纪念老师沈骊英先生

从我们魁阁走上公路，向北，约摸半个钟点的路程，就到三叉口。中央农业实验所有一个分站疏散在这村子里。疏散在附近的文化机关时常有往来，大家用所在地的名称作各个机关的绰号。三叉口的徐季吾先生上下车站，便道常来我们魁阁，我们星期天有闲也常去三叉口望他。在一次闲谈中徐先生讲起了沈骊英先生。

“沈先生是我的老师，”我这样说，“我在小学时，最喜欢的老师就是她。”

我停了一忽，接着说：

“说来这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最后一次我见着她是在东吴的校门前，那时我就在这大学的附中里念书。我母亲去世不久，她是我母亲的朋友，她一路和我说了许多关于我生活细节的话。中学时代的孩子最怕听这些，尤其像我这种乱哄哄的人，一天到晚真不知干些什么，她那时所说的，听过也就忘了。但是，我一闭眼，还记得这位老师的笑容。一副近视眼，一个拖在脑后梳得松松的髻。那时看来算是相当时髦的。至少，她所穿那件红方格子带裙子的衣服，在我印象里是件标准的西装。——”

我一面说着，二十多年前的印象似乎愈来愈逼真：天赐庄夹道的两道红墙，东吴大门口的那棵大树——在这地方我们分手了。本来是路上偶然相逢，你想，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在路上遇着了她幼年的女教师，怎么会说得上什么清楚的话？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插在裤袋里，脸红红的，眼睛潮润润地，只怕有哪个同学看见，多不好意思？

徐先生打断了我的回忆，“沈先生不是在苏州那个女学校里教过书的么？怎会教得着你的呢？”

十多年前，我如果听到这话，一定要脸红，决不会接着说：“是呀，我是在女学校里长大的呀。”徐先生好奇地听我说下去：“那个学校名叫振华。苏州人大概都知道这学校。现在的校址是织造府。苏州的织造府谁不知道？这就是曹雪芹住过的地方，据说他所描写的大观园就依这个织造府作蓝本的。”

我在中学里时，最怕是有人提起我的来历；愈是怕，愈成了同学们取笑的把柄。“女学生！”——在这种心理压力之下，我怎么会有勇气，在我女教师的身边并排着走？校门救了我，我飞跑似的冲进铁门，头也不敢回，甚至连“再会”两字也没有说。可是，虽则这样鲁莽，我却并没有这样容易把这事忘却，二十多年后，还是这样清楚的记得：那副眼镜，那件红方格的西装，和温存的语调。

我进高小刚是十岁，初次从小镇里搬到苏州。羸弱多病使我的母亲不敢把我送入普通的小学。振华靠近我们所住的地方，是我母亲的朋友王季玉先生开办的，而且是个女学。理论上说女孩子不像男孩子那样喜欢欺负人，至少欺负时不太动用武力。不久我成了这女学校里少数男学生之一。入学时我母亲还特地送我去，那时校址是在十全街，就在那时我被介绍给这位沈先生。以后她常带我到她的房里去，她房里的样子现在已模糊了，只记得她窗外满墙的迎春花，黄黄的一片。当时，沈先生，我后来总是这样称呼她，其实还是和这一片黄花一样的时代，但是在我看来，她却免不了已经属于“什么都懂，什么都能”的伟大人物那一类了。我当初总有一点羞涩，也有一些异样：在四年的小学中，老师在我是一个可怕的人物，打手心的是他，

罚立壁角的也是他，一个似乎不太讲理，永远也不会明白孩子们心情的权威。可是这个老师却会拉着我的手，满面是笑容，是个手里没有戒尺的人，这使我不太明白。我想，我那时一定没有勇气望着她的眼，不然，我怎会现在只记得满墙的迎春花呢？

沈先生教我算学，每次做练习，我总是第一个交卷。习题做快了，又不重看一遍，不免时常把 6 写成 8，2 写成 3。“这样一个粗心大意的孩子！”其实我的心哪里是在做算学？课堂外的世界在招惹我。可怪的是沈先生从来没有打过这个顽皮的手心，或禁闭过这个冒失的孩子。她望着我这匆忙的神色，忙乱的步伐，微微的摇着头：“孩子们，你们什么时候才会定心做一个算题？”

过了有十年的一个暑假，我在沪江的暑期学校里选了三门算学课程。天气热得像是坐在蒸笼里，我伏在桌子上做题解；入晚靠窗眺望黄浦江的烟景，一个个还是几何的图形。我不知为什么，一直到现在还是记不住历史上的人名，地理上的地名，而对于数字并不怎么怕；若是有理由可说的，该是我高小里历史和地理的教师并不是姓沈的缘故罢。多少孩子们的兴趣在给老师们铲除送终？等大学毕业，一个人对于学术前途还没有全被封锁的，该算是很稀少的例外了。

我的性格也许是很不宜于算学的，可是为了有这个启蒙的教师，我竟为了它牺牲了一个可以夏游的暑天。

从那天偶尔在街上见面之后，我一直没有见过这位老师。我也没有去想着她的理由。天上的雨，灌溉了草木，人家看到苍翠，甚至草木也欣然自感茂盛，雨水已经没入了泥土，没有它的事了。多少小学里的教师们，一天天，一年年把孩子们培养着，可是，培养了出来，向广阔的天地间一送，谁还记得他们呢？孩子们的眼睛望着前面，不常回头的。小学教师们的功

绩也就这样被埋葬在不常露面的记忆之中了。

一直到徐季吾先生说起了沈骊英先生在中央农业实验所服务，我才引起了这一段内疚。其实，如果不是我当时也在教书，也许这段内疚都不会发生。人情原是这样的。我问起沈先生的生活，徐先生这样和我说：

“她已是一个一群孩子的好母亲，同时也已成了我们种麦的农民们的恩人了。华北所种的那些改良麦种就是她试验成功的。她从南京逃难出来，自己的衣服什物都没有带，可是，亏她的，我们所里的那些麦种却一粒不漏的运到了重庆。我们现在在云南所推广的麦种，还不是她带进来的种子所培植出来的？所里的人都爱她。她是所长的太太，但是，她的地位并不是从她先生身上套取来的。相反的，她帮了她先生为所里立下了一项最成功的成绩。”

我听着了，不知为什么心跳得特别快，皮肤上起一阵冷。一个被认为早已“完成”了的小学里的老师，在我们分离的二十多年中，竟会生长得比她的学生更快。她并没有停留，她默默的做了一件中国科学界里罕有的大事。改良麦种，听来似乎很简单，可是，这是一件多繁重的事？麦子的花开得已经看不清楚，每朵花要轻手轻脚的包好，防止野蜂带来了野种。花熟了，又要一朵朵地把选择好的花粉加上去。如果“粗心大意”，一错就要耽搁一年。一年！多少农民的收入要等一年才能增加？

家务，疾病，战争，在阻碍她的成功，可是并没有打击倒她。她所改良的麦种已经在广大的华北平原，甚至在这西南偏僻的山国里，到处在农民的爱护中推广了。

我从三叉口回来，坐在魁阁的西窗边，写了一封将近五张纸长的信给我这二十年没有见过面、通过消息的老师。我写完这信，心上像是放下了一块石头。我想，任何一个老师在读着他多年前学生的信，一封表示世界上还没有把老师完全丢在脑

后的学生的信，应当是一件高兴的事。我更向她说：“当你在试验室里工作得疲乏的时候，你可以想到有一个曾经受过你教育的孩子，为了要对得起他的老师，也在另一个性质不同的试验室里感觉到工作后疲乏的可贵。我可以告慰你的不过是这一些。让我再加一笔，请你原谅我，我还是像在你班上时那样粗心大意，现在还没有定心做过一个算题。”

我把这信挂号递给呈贡的邮局，屈指数日子，盼望得到一封会使我兴奋的回信。

不到一个星期，徐季吾先生特地到魁阁来报告我一个消息：沈骊英先生脑充血死在她的试验室里。我还是坐在靠西窗的椅子上，隔着松树，远远是一片波光，这不是开迎春花的时节，但是波光闪烁处，还不是开遍了这黄花？

又过了一个星期，我寄出的信退了回来，加了一个信封，没有夹什么字。再没有人去拆这封信了，我把它投入了炉子里。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一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忆《少年》祝商务寿

商务印书馆既是一个印书馆，也是一个育才馆。它不仅以印书为广大人民提供精神食粮，而且为了印书也培养了一大批作家和学者。功在历史。晚近论人才的人每常怀念古代的伯乐。回想我这一代，商务印书馆在当时的文化界实际上起着伯乐的作用。我虽非千里马，但毕生与笔墨结成不解缘，商务印书馆实为之媒。

我还在初中读书时，我的姑父为我订了一份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少年》杂志，我成了这个杂志的爱读者。每期都要从头读到底。读了几期之后，就开始投稿，把听到的故事写下来寄给《少年》杂志。

记得有一年的新年里，收到了该年第一期的《少年》杂志。哪一年我已有点模糊，仿佛记得这期封面上画着几只老鼠。这杂志有一度是以属相记年作封面的；以此推算，可能是一九二四年，我十四岁。我照例按篇章次序读下去，直到最后的“少年文艺”栏，突然惊呼起来，一时不知所措。原来我发现寄去的那篇《秀才先生的恶作剧》已用铅字印在白纸上了。这种深刻的激动，一生难忘。它成了一股强烈的诱导力，鼓励着我写作又写作。我写给《少年》杂志的稿子，在该刊的地位，从此也逐步从书末向前移动，直到开卷第一篇。写作就成了我抑止不住的爱好。

我也常自问，我当时这样热衷于投稿究竟出于什么动机呢？岂是为了好名？但是我当时投稿是保密的，连哥哥们都不知道，我从来也不要他们代笔或修改。在学校里，同学们并不

知道我的笔名。岂是为了报酬？当时我是收到报酬的，是书券，可以凭券向商务印书馆买书。这似乎并不能说是有力的物质刺激，只是一种奖励。要问动机，也许是出于儿童或少年的创作欲，要求有所表现，这种行为取得了结果，可以给人以安慰和满足。日久也就养成了习惯和爱好。这种心理活动里外界的积极反应是必要的。《少年》杂志提供的诱导和鼓励，是养成我这种习惯和爱好的重要因素。

一旦养成了这种写作的习惯和爱好，要改变它也不容易。朋友们大多知道，我这一生中因为这种爱好而惹下的祸是不少和不小的。我也常常听到善意的规劝，何苦老是要写呢？弃笔焚稿，一生可保。我却至今未为所动。真如上了瘾，一时不写，手就痒痒。当然，祸福难言，功过奚论，我还是行我所好吧。

我对自己一生从事写作并不悔恨，所以我对商务印书馆总是抱有感激之情，特别怀念培养我写作爱好的《少年》杂志编辑殷佩斯先生。我过去一直希望有一天能见到他，当面告诉他，我在他的雨露中怎样成长的经过。前几年我特地向叶圣陶老先生打听；叶老和他是早年的同事，但失去联系，不知他的下落。他可能已默默地完成了他的一代的任务。他所主编的《少年》杂志究竟培养了多少作家和学者，我不清楚。但我是个亲身受益的人，我应当对他和同他一样的一代园丁，表示我们的敬意。

让我以此怀念为商务印书馆八十五周年纪念敬致祝贺。

一九八二年元旦于吴江县城

忆小学乡土教育

家乡来信要我为他们正在编写的乡土教材写几句话。编写乡土教材的目的是在使本乡人熟悉本乡事，培养热爱家乡的感情，立志为家乡建设出力。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我愿意支持和参与。其实我几十年来在家乡做社会调查就是在编写乡土教材。现在将有更多的同志从不同角度来介绍家乡不同方面的情况，乡土教材一定会更丰富更充实，我感到十分高兴。

提到乡土教材，我不能不联想起我在小学里沈校长给我们讲的“乡土志”。我一九一〇年出生在松陵镇，当时只说是吴江县城。一九一六——一九二〇年在吴江初等小学里念书，因为校址是原来供奉雷神的雷震殿，所以一般就叫作雷震殿小学。几年前我还去看过，庙已没有，学校还在。旧校舍改建成了大楼，面貌已更新。

大概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门课叫“乡土志”。当时我不大明白这三个字的意义，衍声附会，讹成了“香兔子”。这个荒唐的误会，留下的印象却很深，至今我还喜欢把它作为笑话来讲。我幼年在动物中最喜欢的是兔子，在小学课程里最喜欢的是“乡土志”。这也许是把两者联系在一起的心理原因。

讲这门课程的老师是这个小学的校长。我记得他是姓沈，名天民。我很敬重他，不怕他。他不像有些老师那样老是背着脸流露着讨厌我们这些孩子似的神情。他会拍拍我的小脑袋，微微带着笑容问我这一阵身体可好些了？原因是我那些年常常生病请假，大概在他的眼中我一直是个怪可怜的病娃娃。他对我的关心抚慰使我感到亲切温存，每一想起还是音容宛在。

我敬爱沈校长，也喜欢听他讲的“乡土志”。他在课堂上讲给我们听的，都是些有关我们熟悉的地方，想知道的知识。他讲到许多有关我们常去玩耍的垂虹桥和鲈香亭的故事，至今我每每想起“松江鲈鱼肥”这句诗时，这些桥亭的画面仍悠然在目，使我心旷神怡；同时浮现着沈校长那种摇头吟诵的神态，更引人乡思难收。

我还记得当时课堂上贴近着我坐的那位同学。他叫沈同，是沈校长的儿子。跟我相好，玩耍说笑在一起，课堂上还会忘乎所以地和他在下面搞起小动作来。小学毕业后，我们就分手了，没有料到一九三三年在清华园里我们又聚在一起，我是研究生，他是助教，两人不但口音都没有变，性情脾气也都未脱童年本色。从此几次同事，直到老年。从他口上，我听说他父亲在我一九二〇年离开吴江后不久就去世了。家道清寒，但从不言苦。他一生的精力全都花在家乡儿童的身上。他播下的种子是有收获的，在我前后几班的同学里后来至少就有五个学有所成，包括他自己的儿子，在大学里教书。我写下的各地社会调查也应当归功于他的启发，这是我不敢忘记的。

当然，我也不敢忘记自己的父亲给我作出的榜样。我在吴江小学里读书时，我的父亲是江苏省的视学，视学是教育督导员。他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在江苏省境内巡回视察各地的学校。回家期间忙于写视察报告。我常见他书桌上堆满了各地收集来的材料和笔记。有时为了好奇，趁他不在时，我偷偷地去翻阅这些材料。我虽则很多看不懂，现在还记得的是他随班听课的记录，还有评语，某某教师讲解扼要明白等等。他的视察实在就是在做有关当时教育的实地调查。他并没有料到在他的儿子中后来会有人继承了他的调查工作。他并没有在我面前讲过要了解社会必须亲自去看去问的道理，但是他作出了身教，身教显然比言教更起作用。

我父亲写完了视察报告就请本乡的一位书法很端正的先生抄写，我的两位哥哥的任务是作校对，一人念原文，一人对抄本。我因为年纪小，只配在旁陪坐。这也许是我父亲有意教我们这几个孩子怎样认真写作的方法。校对过后他自己还要阅读一遍，如果发现有未校对出来的错字，就要责备我两位哥哥，说他们校对得不够认真。看来我哥哥后来自己写文章时，字迹清楚，反复审读的习惯是这样训练出来的。而我这个陪坐的孩子却没有学到这一手，直到现在甚至已经印成书的文章里，还是错字常见。在旁边听他们校对，对我也有教育，我后来喜欢写文章，写调查报告，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对我影响更大的也许是父亲每次出差回家总要带回的几部新的地方志。地方志就是记载各地方地理、历史、名胜、人物和风俗的书，其实也就是沈校长所讲的乡土志，和现在正在编写的乡土教材。我父亲在视察过程里收集到江苏各县的地方志，装满了一书架。我也常翻着看，其中如人物传记，风俗节令等也还可以看得懂一些，至少对这类书已不生疏。我在大学毕业时做的论文就是用全国各地的地方志里所记载有关婚姻风俗的记载作材料写成的。

我从一九三五年清华研究院毕业后就开始做社会调查。一九三六年回家乡在庙港的开弦弓村养病，天天同乡亲们谈家常，了解他们的劳动和生活，以及有关生老病死的风俗习惯。后来去英国留学，用这次调查的记录写成了一篇论文，出版时书名为《江村经济》，它实际上是一本开弦弓村的乡土志。我最近十多年里每年回家乡了解情况，发表过多篇访问记。今年春天我又到盛泽、北厍去转了一圈，把我在这十年里所看到的家乡在经济上的发展作了个初步总结，称作“吴江行”，也可以说是一份乡土教材。

下面是这篇文章的结语，写下了我写这篇乡土教材时的心

情：“我在写这篇《吴江行》时，回溯了故乡十年的变化。这是我们祖国在这不平常的十年中的一个镜头。它给了我安慰，也给了我勇气。我故乡的父老乡亲没有辜负这大好年头，为今后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这个基础我相信是结实的，因为它的根深深地扎入了千家万户，它会生长，它会结果。再有十年，就进入二十一世纪了。尽管我不一定能再写《吴江行》，但我的故乡一定会更美好，更可爱。这不是梦想，而应当是故乡人的共同信念。信念会带来力量——创造的力量，前进的力量。”

愿我今后还能为家乡亲友多写一些乡土教材。

一九九一年九月十六日

一代良师

我今天来参加“已故燕京、西南联大社会学教授学术成就研讨会”，大概不讲话也不行。刚才雷洁琼先生讲的话我都同意。我想就雷先生已讲过的发挥一点感想。就是我们对于上一辈人应当怎样看法？怎样要求自己？

每个人都有长处，也都有缺点。我们希望历史不断地发展，一天比一天好，那么就要我们以学习前人的长处为主，否则历史就不会发展了。我们究竟应该向上一辈人学习些什么东西呢？我们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把我们所有的上一辈人都说得一无是处。他们对我们好像只有错误的影响，一点好处都没有。既然如此，那就只有和他们划清界线，一切重新做起了。其实我们中国的历史不是从三十多年前开始的，我们社会学也不是从这几年才开始的。如果过去的一切都应当否定，我们不是成了无源之水了么？今天我想大家已经觉悟到这种对过去全盘否定的态度本身是有害的了。

我常常想到过去的很多老师，我觉得我自己今天的许多知识和思想，的确都是跟这些老师学来的。我觉得我这一生还能说是幸运的，在当学生时碰上了很多好老师。在这里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吴文藻先生、潘光旦先生、杨开道先生。我在燕京和清华这一段生活里接触最多的就是这三位老师了，是他们把我带进社会学这个领域来的，后来在清华，碰到了史禄国，出国后又碰到了马林诺斯基，从他们身上我也学到了一点东西，但没有学好。还应该提到的是吴景超先生，我与他也很熟，但我只上过他一门课，对我的影响没有前面三位老师那么深刻。我

现在在学术领域里所做的东西并没有超过上面所提到的几位老师。我从燕京、清华这几位老师所学的不仅是做学问这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做人这一方面。我深切体会到在他们脑子里经常在想的是怎么把中国搞好，人民怎么富起来，别的都是次要的事情。我相信这几位老师做学问的主要目的还是在这个地方。这是他们做人的精神支柱。我们搞社会学不是为了其他的东西，就是为了要使我们中国的社会更好。什么叫好？各人有自己的看法，大家不一定相同，但有一点大家都清楚，我们的国家不能这样穷。这样弱，我们的中国人不能在现代世界上处在落后的地位，我们在今后的世界上不能低人一等，我们中华民族应当重放光明。

我当学生的时候同这些老师们接触很多，不像现在的师生关系。那时我差不多每个星期总有机会同上面讲的这几位老师见面、讲话，看他们怎么生活，如何待人。现在好像只有在上课时老师才和学生见面，上完课不就再接触了。这样就很难学到东西。做学问是一种最细致的脑力劳动，一定要通过直接接触才能学到。我常这么说，只有通过经常和老师直接接触才能学会怎样做学问和怎样做人。如果光看一个人写的东西，你怎么能知道他是如何写出来的呢？你能学到多少东西呢？

一门学科，必须代代相传才能存在，才能有生命力。代代相传必须通过一代一代人的接触——直接的接触。在接触里把一代一代累积下来的经验和智慧传下去，每一代推陈出新，通过不断的再创造而形成一门学科。学科是人们智慧的积累。

我们下一辈人去看上一辈人时，如果把他们一切都否定了，受害的是谁呢？不是上辈人，而是我们自己。这个对待前辈的不正之风我看还没有完全扭转过来。我们要多看看，看看他们过去的成就，看看他们是怎样得到这些成就的。肯定前人的成绩，不是不要批判他们的缺点。没有一个人的思想是全面和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